

課題：草船借箭

“言以‘神机妙算’”(150—154页)

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三 国 演 义 研 究 論 文 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03 字数135,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7/8 插页2

1937年3月北京第1版 193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45000册

定价(7) 0.70元

出版說明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的編輯，是為了把今天以前新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所寫的論文，分門別類，集中起來，以便於研究者和讀者的閱讀，並從這些論文集里，約略可以看出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發展情況。我們希望這一些書的出版，能對古典文學研究者有所幫助。

這是參考資料性質的書。收輯的範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這些文章如果是較早發表的，往往已經不能代表作者今天的意見；可是，為了忠實於歷史，我們征得作者的同意，不作任何論點上的、原則上的修改。

所收的只是截至發稿以前我們所能找到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散篇論文。未曾發表的文稿，整本的專著，已經被收入作者自編的論文集或其他選輯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

我們現在編出“楚辭”、“樂府詩”、“元明清戲曲”、“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六種研究論文集。文章按其性質略加區分，基本上就發表時間先後排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目 錄

記“三國演義”座談會	周 午 (1)
談“三國演義”	褚斌傑 (10)
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三國演義”	陳大遠 (18)
談“三國志演義”	周立波 (23)
略談“三國演義”	霍松林 (37)
談“三國演義”	顏 默 (54)
關於“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	顧肇倉 (62)

試談“三國演義”的人民性	顧學頤 (81)
試論如何正確理解“三國演義”的正統思想	劉知漸 (88)
從桃園結義故事看“三國演義”的人民性	劉知漸 (94)
我對“三國演義”人民性的幾點理解	魯 地 (102)
對“三國演義”傾向性的初步探索	李景林 (114)

“三國演義”里面的張飛	傅 達 (137)
“三國演義”所塑造的曹操	顧學頤 (142)
諸葛亮的“神機妙算”	顧學頤 (150)
簡論“三國演義”“赤壁之戰”的故事和人物描寫	陳 遼 (155)

從關羽、關衡的問題談到對歷史人物的

分析和評價	少 若 (166)
-------	-------------

附錄：

讀了魯迅“小說舊聞鈔”后關於“三國演義”的

補充	陳登原（176）
“三國演義”的校補工作	顧學頤（180）
簡介新版“三國演義”	孫 模（183）

記“三國演義”座談會

周 午

作家出版社校訂註釋的“三國演義”出版以後，受到廣大讀者的重視。一般認為，這是整理古典文學遺產的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關於這部古典文學名著應該怎樣認識和估價，怎樣幫助讀者閱讀和理解，其中有一些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部分在京的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以及參加“三國演義”校訂註釋工作的人員曾舉行座談會，就這些問題初步地交換意見。到會的有王瑤、王利器、文懷沙、汪靜之、吳曉鈴、浦江清、孫楷第、黃肅秋、舒蕪、游國恩、馮雪峯、路工、翦伯贊、魏建功、聶紺弩、顧學頤（以姓名筆畫為序）等十餘人。座談會由馮雪峯、聶紺弩召集，由馮雪峯主持。

在座談當中，大家所發表的意見，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四個問題。

一 關於“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

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認為，“三國演義”里面的故事，絕大多數是不符合於真正的歷史事實的。其中有些只是來自傳說，或出作者的創造，在正史記載中沒有任何根據。有些雖在正史記載中多少有些根據，但往往移甲作乙，顛倒錯亂，弄得似是而非。“三國演義”現在既經整理出版，接着就應該進行一番史實考訂的工作，分辨虛實，免使讀者誤會，把“三國演義”當作真正的三國

时代歷史的記載去看。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中這些故事細節與正史記載不符的地方固然很多，但究竟只是一些細節，關係還不太大。重要的問題在於，“三國演義”引導讀者擁護劉備，反對曹操；而其善惡是非的基本標準，則是封建的正統思想，具體地說，就是皇帝只應該由姓劉的人去做的思想。在“三國演義”中，凡是維護着劉家的封建政權的，就是好人；凡是不利於劉家的封建政權的，就是壞人。但實際上，劉備不過是在一個腐朽的瀕於崩潰的帝國的名義之下進行掙扎；曹操卻在那樣一個混亂分裂的時代，在他所統治的地區內有效地實行過一些發展生產的措施，而且正是憑藉着這種實力，東征西討，奠定了恢復中國統一的基礎，這些都在歷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曹操本人，也是一個文才武略、赫赫不凡的人，並不完全是“三國演義”里面那樣令人憎惡的形相。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本來就是一部小說，而不是一部歷史教科書，本來就不應該拿歷史教科書的標準去衡量它。問題本來不在於每一個故事是否都於正史有據，更不在於故事的每一個細節是否都與正史記載相符合，而是在於，是否能夠通過文藝的特殊作用，使羣眾對於三國時代歷史的總的輪廓和重大的事件，得到一種生動的、完整的認識。對於一部歷史小說，特別是古代作家所寫的歷史小說，我們只能這樣地提出要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三國演義”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部最成功的歷史小說。在封建的愚民政策的文化統治之下，廣大羣眾能夠得到這種大致不差關於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歷史知識，已經很不容易，很應該感謝“三國演義”的功勞。至於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細節上的準確性，乃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態度之類，如果竟向“三國演義”要求這些，那要求本身就是反歷史主義的了。

有人認為，就是以史學的眼光來看，也不應該看輕通俗歷史演義這種形式。我國的古史，最早的是編年體，後來逐漸進化而有紀傳體，而有紀事本末體。紀事本末體出現以後，所謂“正史”的領域之內，就再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它們都只掌握了歷史的某一個側面，忽略了其他的側面。通俗歷史演義却能綜合它們的優點，克服它們的缺點，因而比它們都更能表現歷史的全貌。“三國演義”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所獲得的巨大的成功，是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的。封建統治階級把歷史知識壟斷在自己手里，這是愚民政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三國演義”却第一次地把歷史知識普及到羣眾中去，把封建統治階級的一些政治策略、軍事技術公開到羣眾面前，這對於封建統治階級無論如何是有些不利的。而這個作用，是任何“正史”都沒有的。在“三國演義”成功榜樣的鼓舞之下，我國小說史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歷史演義。一方面補上去，一直補到“開辟演義”。一方面寫下去，一直寫到“清宮演義”。這樣，整個中國的歷史，就都在歷史演義小說里面得到了反映。但這些演義中，始終還是以“三國演義”為最好。就是世界文學史上，同樣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當中，規模之闊大，氣象之宏偉，能達到“三國演義”這樣程度的，恐怕也是不多見的。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的主要根據，雖是陳壽的“三國志”，但二者却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三國志”對於三國人物，大體上採取一種公平的、客觀的、一視同仁的態度。“三國演義”則是鮮明地、一貫地擁劉反曹，帝蜀寇魏；對於孫吳，於其聯蜀反魏、或對蜀保持善意的中立時，則肯定之，於其聯魏反蜀、或對蜀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時，則否定之：這正是是非清楚，愛憎分明。就這個比較來看，可以說，“三國演義”在一個最根本之點上，較之“三國志”，更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性。歷史的最基本的真實，就

是各種極其尖銳的矛盾鬥爭，特別是三國那樣的時代，羣衆通常不喜歡“三國志”那樣沒有傾向性的、或把傾向性深深遮掩起來的東西。羣衆聽故事，總要問清楚其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這就是要求作者表明擁護誰、反對誰的態度。“三國演義”的鮮明的傾向性，正是它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性的地方。至於它的傾向性本身今天看來是否正確，或者說，在那正統觀念的外表之下是否還隱藏着某種健康的積極的東西，當然是還有待於深入分析的另一問題。

二 關於“三國演義”中的正統思想

與前一問題有密切關係，而在上述意見中已曾涉及的，是正統思想的問題。

有人認為，正統思想根本是一種極端反動的思想。封建帝王製造和宣傳這種思想，用來辯護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用來證明自己的統治的不可動搖性，用來鎮服和欺騙人民，使人民對自己的統治發生敬畏的、甚至某種程度上“愛戴”的感情；同時用來排斥別的封建勢力的競爭，保障自己獨占對人民的統治和剝削。因此，我們對於“三國演義”中正統思想的表現，應該肯定地把它看作是這部名著中的消極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封建性的糟粕，在認識上予以批判和剷除。不過，也應該指出，它在整個“三國演義”中，畢竟是比較次要的東西。而且，在羅貫中的原本裡面，這種正統思想的表現還是很少，很輕微的。在毛宗崗的修訂本即現在的通行本裡面，正統思想的成分才比較加多、加強起來。這就是說，現在我們通常看到的“三國演義”裡面這樣程度的正統思想的表現，其實並不是原本的藝術的有機構成裡面所包含的，而是修訂本裡面后加上去的東西。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的歷史觀，整個都是封建的歷史觀。

正統思想不过是封建的歷史觀的体系里面的一个部分。当然，今天我們並不因为这一点而否定“三國演義”的价值。只要我們明白它的歷史觀是封建的，那么它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歷史教育的作用。正因此，我們就不必專門着眼於正統思想这一个問題。反正我們明白，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孙权也好，总之都是人民的剝削者和压迫者。那么，誰是正統，誰不是正統，“三國演義”所認為正統的是否确实能算正統，这些問題就只是封建統治階級内部的問題，只是在肯定了封建制度的前提之下，應該由誰來在政治上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的代表人的問題。至於今天的我們，不但在理論上早已根本否定了封建制度，而且在實踐中已經最終地消滅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如果還來討論这些問題，顯然是毫無意义的。

有人認為，正統思想这个东西，如果具体地分析起來，恐怕还不能簡單地說它僅僅是一种反动的封建思想。事实上，封建社会中的人民羣众也往往有正統思想。人民對於國家統一的願望，對於和平生活的要求，有时通过正統思想而曲折地表現出來。人民承認为正統的政权，一般地說，就是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因而能給予人民比較和平的的生活的政权。所謂正統，有时又是針對異族征服者的政权而提出的。那么这里面便又間接地表現了愛國主义的思想。異族征服者的統治之下，農民革命的領袖常常自称为先朝皇室的后裔。或者，当皇室中發生皇位繼承的爭奪，而某一个合法的繼承者又失敗了的时候，農民革命的領袖也常常宣傳自己就是那个失敗了的合法的繼承者。在这些情况之下，正統思想又簡直被利用为農民革命和民族革命中号召羣众的一面旗帜了。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中的正統思想，固然不能說是絕對反动的思想，但也不能过分強調地說它只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过分強調地說其中寄託着多少多少人民性的內容。比較实事求是的

看法應該是，“三國演義”既以一個封建時代國內混戰的歷史題材為題材，互相混戰的三方面當中事實上是有一方面以“正統”為號召；它又是一個封建社會中的作家，寫給封建社會中的羣眾看的作品；那麼，其中有着正統思想，也就是對於那以“正統”為號召的一方表示擁護的態度，是很自然的事。這部作品一方面受到廣大羣眾的歡迎，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歡迎，並沒有遭遇到像“水滸”“紅樓夢”被封建統治階級痛斥為“誨盜誨淫”的那種命運，也正因為它表現了這種正統思想的緣故。但是，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特別是一部古典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畢竟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作者的主觀上的愛惡，而是它所具體地反映出來的東西。所以，把“三國演義”里面的正統思想，它的擁護反曹的態度，和它是否反映了當時歷史的真實性的問題糾纏起來，似乎由於作者具有這種思想和態度，就一定會歪曲當時歷史的真實，這是不對的。就拿曹操來說，無論演義的作者怎樣顯然地憎惡他，但是，他的發展農業生產的有效措施，他部下人材之盛和他自己的相當善於用人，他的文才武略，他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優越的政治地位，……我們不都可以從演義當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么？而這一切，不正是曹操之所以必然勝利的原因么？所謂歷史上的進步作用，不也就是這些么？所以，無論正統思想本身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它總之並未根本上妨害“三國演義”反映歷史的真實，這是可以斷定的。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反對曹操，主要地是反對他的陰險奸詐；擁護劉備，主要地是擁護他的仁厚寬和。這是人民對於為人品質方面的愛惡的表現，而與正統不正統的問題沒有太大的關係。不過所擁護的仁厚寬和的人，恰恰又是以“正統”為政治資本來號召的人。這樣，就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是主要地在於擁護“正統”

了。封建社会中的農民，即使在革命起义之中，也往往只是反对貪官污吏、惡霸地主、“無道昏君”，可是却拥护“好皇帝”。他們本來就不知道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所以他們從來也沒有單憑自己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但他們所举行的那些反对“無道昏君”、拥护“真命天子”的起义，其偉大的革命性是不容否認的。同样，反对曹操那样陰險奸詐的統治者，拥护刘备那样仁厚寬和的統治者，这种态度里面所包含的人民性的因素，也是不容否認的。

三 關於“三國演義”对待農民革命的态度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一開場，就讓它所歌頌的刘、关、張三个英雄出來鎮压黃巾起义。有些人就因此根本否定“三國演義”的价值。其实，關於刘、关、張参加鎮压黃巾的战争那一段，在“三國演義”中並不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刘、关、張，按照“三國演義”的描寫，都还是無官無职的“白身”，地位很低，所起的作用当然也微不足道。而刘、关、張之所以成为歷史人物，主要的畢竟不是因为他們曾在“三國演義”中被描寫为参加过鎮压黃巾，而是因为他們参加了漢末的“羣雄角逐”，終於割据一方。至於說他們的事業的开端和基礎就是鎮压黃巾，也是不符实际的。作为“漢末羣雄”之一，他們的事業的开端和基礎，其实倒是在参加十七鎮諸侯討董卓的联軍的时候。整个作品所反映的，主要的是魏、蜀、吳之間的矛盾斗争，而不是刘、关、張与黃巾之間的矛盾斗争。作家所要宣傳的思想，主要的是帝蜀寇魏的思想，而不是拥护刘、关、張反对黃巾的思想。對於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評價，还是着眼於它的总的傾向和主要的內容，結果可以比較符合实际些；如果專門着眼於一些並非主要的部分，而且还要从这里出發，去論断全体，那是很危險的。

有人認為，在分析一部古典文學名著的人民性的時候，其中所表現的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但不是唯一的基本的標準。事實上，封建社會中的人民，對於農民起義的看法，有時是模糊不清的。他們有時會迷惑於一些表面現象，例如農民的無組織性、無紀律性的某些表現，於是看不到它的偉大的革命本質。現代的一些覺悟較低的羣眾，對於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有時還不免發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和懷疑。那麼，古代的人民，包括小說作家在內，有時對農民起義不能正確地認識，就不是什麼可奇怪的事情。“三國演義”不但是沒有把鎮壓黃巾作為主要內容，而且在描寫黃巾起義的時候，大体上也還保持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並沒有加以“殺人放火”之類的誣蔑和歪曲。

關於“三國演義”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的問題，座談當中發表過的意見，綜合起來大致就是這樣。

四 讀者歡迎“三國演義”中的什麼？

座談當中，又涉及了過去“三國演義”的廣大讀者，究竟主要地歡迎其中的什麼東西的問題。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歷來在民間影響最大的，是“桃園結義”的故事，是劉、關、張三人之間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義氣”，是他們之間的“名雖君臣，情同兄弟”的關係。結義的方式，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在人民羣眾中，成了團結自己、互相扶助的一種組織方式。所謂“義氣”，也曾含有強烈的階級友愛的和反抗性的內容。而所謂“名雖君臣，情同兄弟”的關係，實在是封建社會中的農民心目中的理想的政權形式。梁山結義排座次的故事，是這個理想的反映。太平天國天王和諸王之間的君臣而又兄弟的關係，更可以說就是這個理想的實

行。就拿关羽这个人物來說 在某些士大夫的印象当中，強調他的“志在春秋”，“忠於漢室”把他看作“忠臣”的最高典型；但在廣大人民羣众的印象当中，却是所謂“义气”的最完整的代表人物，在所謂“江湖”上，甚至把他加以神化了。對於同一个人物，却有兩個不同的看法，这是很可注意的。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中最受廣大讀者欢迎的，还是那些歷史知識、政治策略、軍事技術、論辯方法乃至那种为人处世之道。人民欢迎这些，反映出他們要求主宰歷史、參預政治、掌握軍事技術的等等願望，也反映出他們對於真理和道德的关怀。“三國演義”在这些方面曾給了羣众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过去都还有着实用的价值。此外，在語文教育方面，“三國演義”也曾起了不少的作用。它的半文半白的文体，曾帮助不少人初步地学会了閱讀和寫作文言文。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中最吸引讀者的，魯迅先生已經在“中國小說史略”里面概括地、明确地指出來，就是兩個东西：“智術”和“武勇”。所謂“智術”，就是對於客觀事物的正确的認識和預見。所謂“武勇”，則是英雄人物的重要標誌之一，特別是在它和“智術”結合在一个“义气”的人物的身上的时候。人民从來崇拜“智術”和“武勇”，这是人民要求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反映。

座談会在談过以上几个問題后結束。大家認為，这些問題都是重要的，还值得在今后加以系統的探討和研究。

（原載 1954 年 1 月 29 日“光明日报”）

談“三國演義”

褚斌傑

我國古典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是一部為人民非常熟悉和喜愛的作品。它的流傳之廣和對人民影響之深，是其他古典小說所罕有的。對於這樣一部經過幾百年時間的考驗，對廣大羣眾起了重大影響的作品，加以慎重地分析和研究，乃是一樁重要和複雜的工作。做好這一工作，對於我們今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實踐和民族形式的創造上，將會獲得很大的啟示。

“三國演義”的演化

“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水滸傳”一樣，是先經過民間流傳的階段而後寫定的。三國故事在民間的流傳開始於何時，我們不得而知，但它的廣泛傳播與晚唐的通俗文學的發展有關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宋代“講史”發達，說“三分”已是“說話”中的獨立科目之一，並還有着很多專說“三分”的著名說話人（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可見三國故事在宋代已很盛行了。因為材料不傳，我們無從知道當時詳細情形。但據蘇軾“志林”的記載，可以知道宋代三國故事已由說話人用來當做“話本”；還可知道在當時三國故事與“正史”相異——是“尊劉貶曹”的。

三國故事的鼎盛時期是在南宋末和元代。據“錄鬼簿”“涵虛子”所記，關於三國故事的劇本就有二三十種。由這些劇本和篇目中，可以看出其故事梗概並非三國信史，而與今日之演義故事相符。

我們現在所可見到的三國故事的最早寫定本，是元朝至治年間（元英宗時，即公元1321—1323）的新安虞氏所刊的“三國志平話”，共三卷，起於“江東吳王蜀地川，曹操英勇佔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冤”一詩，而終於“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三國，劉淵興漢功皇圖”一詩。其中把張飛寫得最為活躍動人。內容存在着許多荒誕的情節。在故事結構、文辭言語上，也都充分地表現出原始的民間作品的本色。因此可斷定，這是當時民間流傳的較原始的材料，是未經文人修飾和加工的。

元末明初的一位作家羅貫中（約1328—1398）接受了民間這部原始材料，而加以改編重訂，使之成為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長篇歷史小說。羅氏把流俗傳說中過於荒誕不經的部分刪去（如開頭的司馬仲相斷獄的一段因果報應），而增加了一些歷史上真實的事實。其中很多有意義的情節被羅貫中加以發揮，而一些不好的地方則被刪去。經過這番“按鑑新編”大膽增刪的工作以後，“三國演義”才正式成書。

“三國演義”的傑出價值和它的長久生命，是與羅貫中的改編工作分不開的。因為，流傳在民間的故事雖然氣魄宏偉，內容豐富，形式新鮮而有生氣，但由於在封建社會中，勞動人民沒有機會得到文化，不能掌握文字，只限於用口頭創作，口頭流傳的方式，這樣，就使一般民間作品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點——零散、粗略和停滯在萌芽的狀態中。它只有經過文人加工潤飾以後，才能變得完整和集中。羅貫中做了這樣的工作，人民的智慧培養了他的天才，他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精華，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提高，完成了這樣的一部為人民所喜愛的偉大巨著。

“三國演義”是人民所喜愛的，但它流傳以後，卻受到很多代